

陈思和 周斌 主编

名师名流

M I N G S H I M I N G L I U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Y
k825.46
7
汉



名师名流 (下)

M I N G S H I M I N G L I U

陈思和 周斌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师名流/陈思和、周斌主编.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

ISBN 7 - 5633 - 5693 - 2

I . 名… II . ①陈… ②周… III . 复旦大学—教授—生平事迹—现代 IV .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783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编:271000)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26.375 字数:700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0.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乘风破万里浪

——刘大白教授传论

■ 谢润宜

刘大白生平与复旦/从旧诗到新诗：刘大白诗歌的文学焦虑/红豆曲中的劳动者之歌：刘大白诗歌的人生焦虑/数理文学儒释道：刘大白诗歌的表达焦虑/刘大白的新诗主张

刘大白生平与复旦

“刘大白”(1880—1932)这个名字埋进过往的烟尘里已经有些年岁了，以至于初初读起这三个字时会有些疏离。“他有伟大的诗句，可惜未曾为人所歌颂；他有沉挚的诗情，可惜未曾为人所珍重……一位可怜的诗人，虽然忠心于艺术，却被许多读者所遗弃了。”¹而细数刘大白的生平种种，恰似翻开一段新文学发端的历史。刘大白虽然仅仅活了52个年头，却拥有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一 传奇人生

1880年刘大白出生在风光秀美的浙江绍兴平水镇一个殷实家庭，原名金庆棪，号清斋。有三个姐姐一个妹妹。作为家中的独子，父亲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借科举之途早登仕途、光宗耀祖，并不惜重金

为幼年的刘大白先后请来两位当地名师。虽然刘大白私下也偷偷阅读《聊斋志异》、《水浒传》等“杂书”，也曾听外号为“老坛”的老家人讲各样的民间故事，但他的整个童年和少年大抵是在苦读中度过的。刘大白13岁时考取秀才，15岁参加“三院会试”考中拔贡生，在乡里被誉为“神童”。

在经书八股中长大的刘大白并没有顺着这条路走下去，他本该赴京入国子监谒选，但就在他考取贡生的那一年，父亲去世，一年的服孝期给了他喘息和重新思考自己前程的机会。尽管16岁的他对于未来、对于自己真正的意愿还不甚明朗，他却坚决放弃了一直出于被迫而走的科举功名之路，决心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不久迫于生计压力，他在绍兴师范学堂和山会小学堂两所新式学校谋到教职，讲授国文，携妹妹、“老坛”迁居到绍兴城里。教学之余，刘大白不仅创作旧诗词，更对之前很少接触的数学领域产生兴趣，专心研习了8年数学，写作《未见书室算稿》，可惜没有刊行。

刘大白在绍兴的小学任教了8年后，因为受到失恋的打击，并为了躲避幼年时父亲订下的亲事，前往杭州灵隐寺出家。在寺院中的几年光阴，刘大白精研佛理，常常和师兄弟们进行信仰和人生的讨论。终于发现寺院非久留之地，还俗后，受革命思想和英雄辈出的时势吸引，而立之年的他北上游历，“举大业，寻真理”，本意就是想参与到政治运动和革命的洪流中。

在北京，刘大白结交了任瘦红等同乡，一心寻找与同盟会接头的线索。一次在酒楼上乘兴作《我有匕首行》一诗于壁上，取诗中“豪杰供虔刘”与“大白浮”两句中“刘大白”三字作为署名，自此“刘大白”这一笔名才诞生。半年后返回家乡，认识了北京进步朋友介绍的身在绍兴的同盟会会员王世裕。两人合编《绍兴公报》，报纸尽量采用白话，辛亥革命时为革命摇旗呐喊，并且参与妇女解放等很多社会问题的讨论，在当时的浙江广为流传、影响深远。袁世凯篡权后，报纸因主张讨袁而受到查封，1913年刘大白被迫流亡日本逃避迫害。

在东京，刘大白结识了沈玄庐等革命志士，并加入同盟会。不久又因为反对日本对华的“二十一条”，受到日本警视厅监视，又离开日本

流亡南洋，在新加坡苏门答腊一带教授国文。直至袁世凯称帝失败身亡的1916年，刘大白才回到国内，受聘为《杭州报》主笔，对当时中国混乱的政局和军阀割据的状况非常失望，在门上题写了“白屋”二字，并镌刻了一方“寻常百姓”的印章。

1918年，受好友蒋梦麟的影响，决心投身教育，担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简称“一师”）国文教员。当时的一师从经亨颐校长到普通教员都比较开明和进步。在不久后爆发的五四运动的洪流中，一师积极响应，刘大白也参与游行和宣传，被称为“五四浙江四杰”之一。1920年一师受到浙江当局的压制，经校长被撤职，刘大白被迫辞职，在浙江农村游历，却因为患肺病中断游历回到杭州，病情稍微好转后开始担任春晖中学、浙江第五中学、衙前小学等几所民办学校的老师，时常往返于三地。

1924年，刘大白的好友邵力子原本在复旦任教，因为要南下黄埔军校任职，就向校方推荐刘大白来担任此教职，刘大白便来到上海，受聘为复旦大学文科部教授，同时兼任上海大学教授。

1928年，受蒋梦麟之邀，刘大白辞去复旦教职，担任浙江省教育厅秘书长兼浙江大学秘书长，离开讲台走入仕途。被来往文函和会议应酬包围的刘大白对官衙生活始终不能够完全融入，虽然有振兴教育的理想，却囿于现状无法从心所愿。没想到官运却继续走高，1929年因为蒋梦麟升任教育部部长，刘大白也成为了当时民国的教育部常任次长。1930年12月，蒋梦麟辞职，刘大白也主动离职回到家乡。

刘大白最后一年多的生命，是在严重的疾病中度过的，但他此生直到最后一刻，依然笔耕不辍。

二 著作成就

正如刘大白的好友蒋梦麟所言：“刘大白先生是一位诗学、文学、佛学、史学、行政、政治都有兴趣的人。这种多方面兴趣的人，在当时是不多见的。”²刘大白在著作方面，同样涉猎面很广。

刘大白早期就开始写作旧诗词，其中的精华结集在《白屋遗诗》

中,此外他在《旧诗新话》中也引用到自己的一些旧诗词作品。五四运动爆发后,刘大白也开始写作新诗,并且在当时取得了很高的声名,新诗集有两本:1924年的《旧梦》和1926年的《邮吻》,其中《旧梦》由于出版的印刷质量不能够令到刘大白本人及读者满意,因此后来将其中的《丁宁》、《再造》、《秋之泪》、《卖布谣》四部分单独成册分别出版。刘大白还写作杂文,有针砭时事的,有抒发感受的,我们今天能够在《白屋文话》中看见一些。

创作之余,刘大白也在进行诗歌研究,陆陆续续有各种论述发表于报章杂志,集成《白屋说诗》和《旧诗新话》两本专著。赵景深曾对《白屋说诗》中关于声韵形式的讨论及《旧诗新话》中的《八病正误》一文大加称赞,认为极有价值。更为重要的,是他晚年呕心沥血的巨著《中诗外形律详说》,把中国几千年来诗歌的外形律做一个详细的划分和梳理,夏丐尊在此书的跋中提到“中国自古不乏诗的研究者,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刘大白可谓破天荒第一人”³。

刘大白的文学研究工作除诗歌以外还包括文学史研究,虽不是专攻文学史的人,他的《中国文学史》却有独到之处。比如对文学史的态度,刘大白主张采用鉴赏的态度;对文学史范围的认定,刘大白主张是诗篇(含诗词曲赋骈文联语)、小说、戏剧三类。并且刘大白坚持采用历史的方法,每逢讲到某一时代,必指明这一时代的主潮;讲到某一种文体,必说明它的起源和演变;讲到某一作家,必考明他的作风来龙去脉和对后世的影响。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刘大白的《文字学概论》和《五十世纪中国历年表》。可能由于刘大白是研究过数学的人,所以不管是对古文字还是对五千年来中国的纪年,他总是能够拿新的眼光,整理出一个精细的系统来。

《故事的坛子》在刘大白的诸多著作中十分特别,这本故事集取材于刘大白童年时候家里的一位外号“老坛”的老妈子所讲的民间故事,却写作于刘大白人生病痛交加的最后一年多。“他的态度是这么诚谨,他的笔致是这么平易流畅。”⁴对刘大白而言,这不仅是在从事一项民间文学整理工作,更是他本人在体会每一段往事的同时和读者分享最本真的乐趣。

三 复旦岁月

从 1924 年 2 月至 1928 年 1 月, 刘大白在复旦度过了将近 4 年的光阴。这段生活可以算作是他执教生涯的高峰, 是他坎坷人生中的一段舒心岁月, 也是他后来走入仕途的起点。刘大白多次在文字中表示非常喜欢复旦的自由空气和求新精神, 也喜欢复旦这个组织——他始终认为学校是社会上一个自由的组织。

1. 教书育人方面。刘大白进校后教授国文课, 1925 年 9 月开始, 还担任中国文学史、历代诗选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他是一副瘦长的脸孔, 似乎有一种阴鸷而不留笑影的眼睛, 从深度的近视眼镜中漏了出来, 老不能承受学生们的欢迎。刘大白虽以古文叛徒著名, 其语音仍不改其乡音——满口还是‘哼个老倌’的声调, 使聚首一堂的四方髦士听了莫名其妙。”⁵由学生对他课堂教学的回忆看来, 刘大白并不是一个上课很出彩的老师, 不善于用幽默的言语、花哨的故事来点缀自己的课堂表述, 刘大白自己也这么觉得:“你们知道, 我从十几岁开始, 已经断断续续教了二三十年的书了。我自认为这是一桩神圣的事业。尽管我的学识有限, 上讲台后就显得拘谨, 在课堂上难以吸引学生, 但我还是努力地去做。写讲义时, 为了弄清一个字的涵义, 往往要查阅一大堆书。课堂上的缺欠, 课余去弥补。”⁶刘大白拘谨的课堂表现背后却是严谨, 他的勤奋在当时的复旦有目共睹。由于 1920 年就发现了自己身患肺病, 刘大白来上海后在学校附近找到一处住房, 并雇了一个女佣, 让他的四个儿女入住, 他自己则一直住在学校的江湾单人宿舍, 和学生沟通非常方便。“有时因为功课上的关系到宿舍里去会他, 虽然是在寒夜, 依然看见他在那里写东西, 桌上很凌乱地放着这些工具书如《辞源》之类, 用的是紫罗兰墨水和毛笔。同去看他的同学有赞他‘用功哪!’的, 他笑而不答。”⁷

2. 校系工作方面。复旦大学中文系是 1925 年成立的, 之前叫做国文部。刘大白在复旦的时期正是中文系的酝酿和初创时期, 刘大白为中文系的初期建立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6 年 2 月起他任复旦大学中

文系系主任。那个时期的复旦,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图书馆。中文系里有间屋子,放着一些书,算是图书馆。刘大白就把自己的藏书都放在里面,作为学生的参考书,所以那时候系资料室里的很多书封面上都盖有“寻常百姓”篆字白文小方印(刘大白的私人印章)。晚上,他也常常和学生在一起,坐在图书室内读书,和他们切磋学问。并且,熟悉刘大白的人都公认他学问之外亦长于幕府之才,郭任远代理复旦大学校长后,聘刘大白做秘书长,许多的行政方针都取决于刘大白。在笔墨之外,又得应付各方,刘大白当时是很乐意做的。

3. 个人创作方面。复旦执教期间,刘大白继续在校外一些有影响力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比如《维持风化》发表于《民国日报·觉悟》,《我底恸哭》发表于《文学周报》,《中国旧诗篇中的声调问题》发表于《小说月报》。同时,刚来复旦,刘大白就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新诗集《旧梦》,在复旦的几年间他仍旧坚持写作新诗,当中有一部分被选入1926年12月出版的第二本诗集《邮吻》。并且,他也零星地写作《风絮》等旧诗词,结集在《白屋遗诗·西泠小草》中。但刘大白更多的精力是投入到了复旦的校园写作中,刚来复旦,他就曾为1924年复旦的年刊《甲子年鉴》作序,随后开始为《复旦周刊》专辟的“谈话栏”撰写文章,提倡白话文,攻击文言文。他称白话文为“人话文”,文言文为“鬼话文”,在校内外有一定反响。这些文稿以后结集在《白屋文话》一书中。1925年1月1日为《复旦季刊》撰写《〈熟理精蕴〉纠缪》,表现了他渊博的知识面和对数学原理的深入认知。不久孙中山先生去世,刘大白在学校召开的悼念会上作了一次演讲,题为《无母之儿》,引起强烈反响。1925年10月,与徐蔚南、陈望道等人编辑《黎明》周刊。该刊自创办至结束共出52期,刘大白每期都有文章发表,这里成为他在复旦发文的主要阵地。刘大白为《黎明》所撰文多为政论性文章,笔端异常辛辣,重要的有《我想提倡的几种主义》、《国家事不着尔等当心》、《对于批评自杀者的批评》等。以后结集的《白屋说诗》、《旧诗新话》和《中国文字学》、《中国文学史》等著作,均完稿于这个时期。

刘大白的复旦岁月里,还有一件事情特别值得纪念,那就是1926年2月15日他撰写了复旦校歌。这首校歌经肖友梅、黄自谱曲,传唱

一时，据说当时复旦周边无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会跟着哼“复旦复旦复旦”。直到今日，这首校歌还备受复旦师生的青睐，作为复旦历史上最著名的校歌成为百年校庆的备选校歌之一。原文录如下：

复旦复旦复旦，
巍巍学府文章焕；
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政教罗网无羁绊。
无羁绊，前程远；
向前！向前！向前进展！
复旦复旦复旦，
日月光华同灿烂！

复旦复旦复旦，
师生一德精神贯；
巩固学校，维护国家，
先忧后乐交相勉。
交相勉，前程远；
向前！向前！向前进展！
复旦复旦复旦，
日月光华同灿烂！

复旦复旦复旦，
沪滨屹立东南冠；
作育国土，恢廓学风，
震欧铄美声名满。
声名满，前程远；
向前！向前！向前进展！
复旦复旦复旦，
日月光华同灿烂！⁸

从旧诗到新诗：刘大白诗歌的文学焦虑

1929年11月的《当代诗文》创刊号上，刘大白以《从旧诗到新诗》为题撰文，但其实从旧诗到新诗的问题已经纠缠了他很久。

一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过了而立之年，呈现在刘大白面前的才是新的国家，之前的岁月是在光绪和宣统两任皇帝在位的清朝末尾度过。其实清朝末尾已经是个蠢蠢欲动的时代，各样的新鲜思潮涌入，政治、社会乃至文化的变革都已在酝酿之中。以文学为例，诗歌方面，就涌现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新诗派”，以及让诗歌“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诗界革命”；小说方面，“小说界革命”试图将小说的政治宣传与思想教化功能极大提高，企求达到“改良群治”和“新民”目标；文章方面，同样有“文界革命”在激荡，他们要求打破“桐城派”古文的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的新文体；文字方面，裘廷梁等人已经开始呼吁提倡白话文，实现“言文一致”的语言变革。

而这些变革的潜流涌动到底不如以后“五四”时的振聋发聩，1900年前的浙江小镇依旧平静而古朴，刘大白在江南小镇上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都仍浸淫在诗书八股中，尽管这个是他后来所厌弃的，但也正是他日后所有人生活的源泉之一。据说他9岁时就曾有“阿弟初生时，哥哥尚扶床”这样的诗句，与“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相似，虽然他那时并没有读过《孔雀东南飞》。可见他良好的古诗天分。人常常可以背叛很多人和事，但唯独不能彻底背叛自己。刘大白少年得志，被乡里称为神童，算是旧时正途贡生出身，古文根基的扎实，直到复旦执教时期仍然为他的同事所称道，也是他后来进行文学研究乃至创作的重要资源。

五四运动刚一爆发,刘大白就开始学作新诗,他从旧诗到新诗的基本态度肯定是弃旧诗而追寻新诗,并且对他而言,从旧诗到新诗最突出的是语言文字的变化,即从文言诗到白话诗。与胡适写《白话文学史》来为白话文正名类似,刘大白追溯中国古代的白话诗篇源流,指出“工具上的解放,是不用鬼话而用人话……用人话写出的诗篇,二千年来不曾断绝……即使那些死活要反对用人话写出诗篇的活死人们所做的诗篇中,也无不有人话夹在其间”⁹。

从文言诗的长期浸淫者变成强力声讨之的斗士,看似转变激烈,而这样程度激烈的转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并不少见,且类型各异,比如《画梦》的作家何其芳奔赴延安后成为革命文艺理论家。对于刘大白这一代人而言,虽然文白之争从来都是个话题,但五四新文学革命突然间的摧枯拉朽之势令人惊叹,除了极少数人他们这代人几乎很少去阻碍这种浪潮,相反他们积极地投身新文化的宣传中,也迅速地产生了新的作品和理论。而这一代人,正如前文提及的刘大白,恰恰是应该对旧文化依依不舍的。

论起刘大白们转变的因由,当然应该考虑到“五四”之前新文化的潜流就已经发生,只是在之后开始燎原,有水到渠成之势。但更重要的是以下三点:

一是旧学生涯的影响。今天的我们来看他的旧学生涯,明显地对他本人有三大影响:其一,奠定了古文基础;其二,逼成了苦读的功力;其三,令他最终成为古文的叛徒。初看起来,第三点似乎很吊诡,但事实上对一个事物了解深透了,就更会明白其中的弊端种种。尤其它曾经是他的全部,是他的前途所系、晋升之途,并且占据了他所有的思维空间,而未必是他本人的兴趣或喜爱。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除科举时刘大白挥笔写下了题为《八股祸》的诗:“排偶文章费琢磨,半千年始息风潮;销磨两代英雄尽,愿借秦皇火一烧。”¹⁰

二是新文化与政局时势的变动紧紧相连。八股流弊已久,文言诗文更是“源远流长”,一直无法在真正意义上铲除,但进入20世纪,巨大的社会变革到来。科举废除,连封建皇朝也崩溃,西学东渐,一次又一次的革命带来新的社会形态设想。以科举废除为例,假定科举制度

仍然存在,不管人们多么厌恶八股,仍然会每天守着四书五经天天诵读,甚至都不会让个人厌恶的情绪被释放出来。1930年代的抗日文学,19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乃至“文革”期间的文学,每一次文学乃至文人的剧烈变动,大多与时局和时局所引导的思想态度有关,唯此,才可以少反复和争论,多统一和集中。

三是不愿被淘汰的心。这一代人很多是抱着新生的态度来过日子的,也许凤凰涅槃的勇气才能够造就新的辉煌,从“凤已啄倦了/凰已扇倦了/他们的死期已近了”到“我们更生了/我们更生了/一切的一/更生了/一的一切/更生了”,是个极为痛苦但必须斩钉截铁的过程,否则就会被巨大的时代变迁所淘汰。刘大白本人很惧怕“因袭”这个词语,惧怕“因袭”和时局所引导的思想态度有关,唯有“他于艺术生活现实生活,都觉得常有因袭的重担压着他;他觉得尽力地挣扎,有时还不免被压住了,动弹不得”¹¹。倘若刘大白们年轻很多,像刘大白的学生那一代一样,读新式的学校,头脑里充斥着新的观念,就没有从前的负担在,可以风风火火血气方刚地振臂高呼;倘若他们年长很多,反正已经行将就木,或者已经功成名就,当然可以随着从前的惯性继续过下去,不用赶时兴,也不用非要在时代潮头立足;但刘大白们正当盛年,是的的确确的夹缝中人,必须从那个缝间走出来,才可以有广阔天地,而他们的很多言论和观念也是他们不断为个人的进步寻找注解和依托的过程。

这就不难理解在新文学运动的开初,刘大白就开始热情洋溢地撰写他的新诗,尽管那时候他的旧诗已经写得相当不错,而新诗水准仅仅如同一个刚学步的孩子。我们来看他最早的新诗之一《淘汰来了》中的两节:“回头一瞧,淘汰来了! /那是吞灭我的利害东西哪! /不向前跑,怎地避掉! /待向前跑,也许跌倒——/唔,就是跌倒,挣扎起来,还得飞跑! /要是给追上,/怎禁得他的爪儿一抓,牙儿一咬? /咳,淘汰啊淘汰,/你为甚么苦苦地追上来! /你要是追得慢点儿,/我还不妨偷点儿懒。/你如今追得这样紧,/我没法儿只有努力地向前进。/咳,都是你苦苦地追上来,/累得我欲罢不能,/还要惹人家称奇道怪!”¹²

这其实是刘大白和刘大白的许多同龄人的共同处境。然而倘若我

们挖掘到他们的灵魂深处，会发现表面上他们怕的是旧式文学观念的缠绕，爱的是轰轰烈烈的新景象。但其实隐隐约约中，他们有对新世界的恐惧在，有对旧时光的留恋在。这又是一重矛盾了。

所以，刘大白仍然不断地写作旧诗，研究古诗词的韵律种种，其中多数是他偶遇大事所作，比如在一师，为挽留经校长而写的长文，就是用文言写就。他的新诗中也常常有旧诗的意境笔法。刘大白内心里其实对自己的旧学根基是颇有自信的，但却不愿意向人提及，而往往成为个人把玩的手笔。想来真是周折，当初被逼习得的旧文却在不断的淘汰变迁和新观念的呐喊中成为个人文学安全感所在，而被新学包裹的这一代人到了此时对于旧学的态度反倒褪去了功利的色彩而成为一种纯粹的私人行为。刘大白有首小诗题为《自嘲》，我宁可把它理解成为这一代人在某些脆弱的瞬间对自己文学状态的自嘲：“老娘三十嫁人迟，偷画双眉冀入时。更买胭脂恣涂泽，效颦应笑类东施。”¹³

这么一诠释，似乎这一代人生活的别扭而艰难，不断地处在痛苦和无措中。但当历史真正成为每日的生活时，很多事情都水到渠成了。主动的和被迫的，外界的和个人的，许多前因后果在人生中不断地发生。而这一代人在整个过程里虽然逼仄但大多都抱有真诚而积极的态度，有率真纯净的信念一以贯之，就像刘大白自己所说“充分享受生命福，又充分使用生命力”，所以这一代也是大师辈出的一代。“我知道他，在心中也曾深想绝灭了憎恶愤怒等情感，在笔上却不曾丝毫掩饰过这一等。而他底不事掩饰写出来的诗文之间，据我所感得，正如毫不掩饰地做出来，始终有所谓爱的精神贯穿着。”¹⁴

怕和爱是刘大白们的共性，但对刘大白而言，这是种格外的焦虑。刘大白的早逝使他几乎所有的成就都停留在新文学运动后的第一个10年，正是淘汰迅速、新旧交替的时期，而从他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刘大白本人格外受制于此的创作表现。

二 新诗：新生或因袭

刘大白的新诗代表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期的新诗，也就是

从旧诗蜕化到新诗过渡期间的诗，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胡适所说刚放了脚的妇人。坦白地说，刘大白的新诗作得并不好。但研究完美的对象并不是文学研究者的使命，漏洞百出的有时反倒会让我们领悟得更多，并可能更深入理解作品背后牵扯的东西。

对他新诗不好的评价也并非我的胡言乱语，几乎所有刘大白新诗的评论者都有如此的认知。赵景深在评价刘大白的《旧梦》时说：“在这近四百首的小诗中，很少有几首好的。”¹⁵但刘大白却是以诗人著称的，这个“著称”一方面由于他诗歌的文学史意义——毕竟是中国最早的新诗诗人之一，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一部分诗歌内容和艺术风格的特色的确有可称道之处，这点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中详细说明。

刘大白新诗的“不好”之处究竟在哪里呢？从直观上这个“不好”与刘大白新诗形式上的两种倾向相关联，我把两种倾向概括为因袭和新生。其实“倾向”本身是中性的，如果运用得好，甚至还是褒义的、大有可为的。可惜刘大白运用得并不十分自如，“用平白如话的语言，写出无穷的韵味，绝非易事！我那时虽然想顺应潮流，却常有力不从心之感”¹⁶。

首先来看刘大白新诗的“新生”倾向。当时新诗的领军人物胡适在《论新诗》中提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诗歌的散文化倾向在新诗的起初的确大有裨益，它使诗歌的发展突破晚清“诗界革命”的局限，打破诗的格律，以白话写诗，更接近说话。刘大白正是这么做的：“一个活跳的人，/掉下在一眼深深的井。/井里面又黑暗，/又潮湿，/又冰冷。/跳是跳不出，/活也活不成，/没奈何大声地喊‘救命’。”¹⁷又如：“恋爱是创造的，/不是占据的，/但是各自创造，/只能各自赏鉴，/所以恋人是只能独有的艺术品。”¹⁸刘大白这样的诗有很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诗的新生似乎有点过了，他的很多新诗就像是完全白话的文章分行写而已，的确是让人感觉和古诗迥异，甚至一刀两断了，却令诗的艺术价值本身受到了损害。刘大白知道自己的不足，但也仍然对自己的新诗满怀热忱：“说这些作品没有价值，不承认是诗，也没有什么。我在努力运用那自由的诗句，表现我自己。”¹⁹

同时期的周作人在给《旧梦》初版写的序中特别强调：“虽然他自

已说诗里仍多传统的气味，我却觉得并不这样：据我看来，至少在《旧梦》这一部分内，他竭力的摆脱旧诗词的情趣，倘若容我的异说，还似乎摆脱太多，使诗味未免清淡一点……现在的新诗人往往喜学做旧体，表示多能，可谓好奇之过，刘大白先生富有旧诗词的蕴蓄，却不尽量的利用，也是可惜。”²⁰其实刘大白并不是不利用，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方法来利用，他新诗中对古典的运用也相当的多，这便是刘大白新诗形式的另一种倾向：“因袭”。“秋风也不回头，/秋水也不回头，/只爱送将人去海西头。/前夜也月如钩，/昨夜也月如钩，/今夜偏偏无月上帘钩。/人去也倦登楼，/月黑也倦登楼，/却怕归魂飞梦堕层楼。”²¹再看这首：“一片片，/一重重，/蓬蓬松松，/湿云满空。/几潮雨，/几潮风，/把薄薄的新凉做就，/更一分一分地加重。”²²

这两首诗，前者有李煜“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的气质，后者则让人有李白“一番风过有新凉”的联想。这样的诗初读上去是很有味道的，也算是刘大白运用传统笔法写出的不坏诗作。但刘大白的诗集给人的感觉却是，除去“新生”的那一部分缺乏诗味的诗，就是接近古诗的新诗，甚至连这些接近古诗的新诗连情绪风致也与古诗无异，这就不免让人有点乏味了。

“酒醒梦回时，/是甚么滋味？/何况晓风残月，/撩人心绪？”²³这分明就是柳永《雨霖铃》的现代译文，虽然也加进了些现代的情绪，刘大白圆熟的文字和古诗底蕴可以带给读者享受，却难以带来全新的读诗体验。当然也有集合了新诗口语化和旧诗用词的诗：“挨过了黑懵腾的月尽夜，/到初三才像个钩儿挂，/到十三算像个球儿赛，/到廿三又像个弓儿卸/你怎圆得这么难，/缺得这么快？/真美满的光明没几时，/长教我心儿怕……怕也！”²⁴

因而读完刘大白所有这些诗歌，新生的与因袭的，不免觉得可惜。虽然他一直研究诗的格律，但并未为新诗创作一个新的优美的样式。仿佛他一直为之付出无比心血的新诗创作，所创作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新诗。而与他同时期或稍晚的冯至、徐志摩等人就以他们各自的努力做出了一些精美的试验，比如冯至早期的抒情诗《蛇》，采用半格律体，节奏舒缓、音韵优美，却充满着现代的情绪和语汇。

刘大白在旧诗与新诗的焦虑中始终处在不平衡状态里,这是他新诗的致命伤。不是偏向完全生涩缺乏诗味的一类,就是偏向从旧诗脱胎缺乏新诗气质的一类。诗歌的形式本身不是散漫随意得紧,就是对诗词格式地模拟。并不是说,在这种跷跷板中就没有令人激动的火花了。刘大白的好诗中有很多是短诗,也许是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冰心早期的小诗也是如此。短诗客观上的好处是寥寥三言两语,既不至于成为没有章法的说话,也没有足够的行列进行与旧诗词的对仗。比如《泪痕之群》之九十三:“微云/谁向遥空抹这一笔呢?”又如《孤树之群》之二:“一夜西风/当前的秋林也瘦了。”再如《旧梦》之二十六:“最重的一下/扣我心钟的/是月黑云低深夜里/一声孤雁。”²⁵

刘大白好诗的另外一种是脱胎于旧诗但穿上民间歌谣形式的新诗,民间向来是文人创作的巨大宝库,而且生命力极其旺盛。刘大白对民间歌谣并不算精通,借用一点点腔调却已使诗灵动不少。例如《卖花女》中的一些语句:“花儿真好,价儿真巧……东家嫌少,西家嫌小……江南春早,江南花好……杏花红了,梨花白了……浓妆也要,淡妆也要……买花人笑,卖花人恼。”²⁶更加著名的是这首《田主来》:一声田主来,/爸爸眉头皱不开。/一声田主到,/妈妈心头毕剥跳。/……妈妈泪一揩,阿二唇一跷……”²⁷刘大白的民谣诗大多比较成功且富有特色,题材则多以《田主来》之类反映民间疾苦的为主,这将在下一章得以详细阐述。

新诗诞生之初,就出现了以沈尹默、俞平伯为代表的半新半旧诗,他们的诗甚至可以说是“词话的新诗”;出现了胡适、玄庐为代表的说话诗,他们的诗多半比较散文化;也出现以刘半农为代表的歌谣化倾向诗。但因为当时的新诗尚不成熟,诗人们对各种倾向都有所尝试,刘大白就是一例。刘大白以其不算成功的新诗创作经验给我们很多启发,他在《再造》一诗中说:“永久的完全,是不能有的;继续的创作,是不可无的。”²⁸他孜孜不倦的努力让我们看到在新旧交替的年代里诗人对诗歌进行“再造”的勇气和艰辛。